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癸卯年万岁

——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

严昌洪 许小青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癸卯年万岁

——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

严昌洪 许小青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癸卯年万岁——1903 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严昌洪 许小青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6-3

I. ①癸… II. ①严… ②许… III. 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中国—1903 IV. ①K257.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17 号

癸卯年万岁

——1903 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

作者:严昌洪 许小青 ㉔

责任编辑:张 忠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enupress.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5.5

字数:238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47.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
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
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
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
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
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
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
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
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
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
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
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
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
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
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
“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
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
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
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
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
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
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
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
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
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
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论 1903 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代序）

章开沅

在辛亥革命的编年史上，癸卯年（1903 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国，江浙又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地区。不仅因为资本主义在这里发展最快，资产阶级势力在这里比较活跃，而且因为这里出现了一支生气勃勃的进步知识分子队伍，出现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空前的滋长和蔓延。

（一）

如果说，东京留学生界是海外的革命策源地，那么江浙便是国内的革命策源地，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策源地。这一点，当年江浙地区进步知识界是已经意识到了的。

“夫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翹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争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权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之无进步矣。”^①

这是从广义的江南地区来看进步知识界思想演变的迅速。

爱国学社在上海的建立，全国为之瞩目，甚至连海外的学生、商人都极为关注。“仿佛这个学堂可以造就出来许多拿破仑、华盛

^① 杜士珍：《论德育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新世界学报》，1903 年 3 月 15 日，第 14 号。

顿、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的一般人才来。他们顽固的官场又道这个学堂希奇得很，他们办下去，必定要造就出来许多造反的家伙，仿佛有许多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孙文、康有为一般人才。”因此，江浙的进步知识分子反躬自问：“这样看起来，我们爱国学社之办好办不好，办得下去办不下去，不是关系中国的大局么？不是差不多中国的兴亡都赌在这一个学堂里么？”^①

接踵而起的浙江大学堂（原求是书院）退学风潮，也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诸君！吾所谓建设新中国小舞台，出现于浙江省会者，何事乎？即近日大学堂退学诸君所建设之新民塾是已。观其脱专制之轭，秩序井然，无一暴动，真可谓文明自由者。彼又固结团体而以自力建设其理想中完全粹美之学校，是真所谓具新中国国民之资格者。呜呼，诸君而日日欲脱专制昌民权者，盍于此小试其手段也？”^② 这是江浙进步知识界对大学堂退学生仿照爱国学社建立的新民塾的评价与期望。

学潮，或者用《苏报》的说法——学界风潮，是20世纪初在旧中国的大地上出现的新事物，而江浙则是1903年前后学潮最为鼓荡发达的地区。自从壬寅年（1902年）夏杭州养正书塾（后改名杭州中学堂）风潮，10月南洋公学200余名学生退学大风潮以后，癸卯年（1903年）3月又连续发生了南京陆师学堂散学风潮和浙江大学堂退学风潮，其他杭州蕙兰书院、上海广方言学堂、苏州毓元学堂等校也相继发生风潮。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四亿人民都蒙受了空前的屈辱，然而20世纪的到来毕竟又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希望。青年学生是社会中最敏感、最活跃的一种力量，因而进步人士便把希望寄托于正在蓬勃兴起的学潮上。他们充满信心地说：“然吾观学界风潮溯江而上，昔年骤发于上海，今已派入金陵矣。自金陵而安庆而武昌而重庆，必有相继者，可预信也。长江上下游，风潮怒翻，而黄河南北必有起而应者，可预信也。自北而南，而西江上下游各行省，如广东奴隶极点之学

^① 《教育会会员蒋君性才由日本寄来演说稿》，载《苏报》，1903年5月21日。

^② 《敬告浙江志士》，载《苏报》，1903年4月19日。

堂，亦必有起而应者，可预信也。以长江为中枢，北而黄河，南而西江，风潮遍及，由水而陆，则可普及全国，吾惟日夜祷祝。”^①
“我中国学界之风潮，其膨胀于二十世纪中者，今日其起点乎？”^②

把全国革命运动的普及，仅仅寄托于学界风潮的发展，这未免过于夸大了青年学生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农民乃是国民革命的基础。但在1903年，江浙地区的先进知识界毕竟具有慧眼，他们已经看出，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是反动而又腐朽的封建帝国的对立物，是属于未来的新中国的国民。“民约服卢梭，强权伟斯宾，潜心观天演，愿从达尔文。”^③ 这些用进化论和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初步武装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同于历史上那些爱国而又忠君的封建士大夫，甚至也不同于戊戌变法时期那些彬彬儒雅叩头上书的举人老爷。他们虽然多半出身于封建文化营垒，然而已经决心与古老的旧中国诀别，并且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埋葬统治已达二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从世界观与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来看，他们比较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范畴。他们的青春似火、热血如潮，心甘情愿地为祖国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而献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也只有他们是自觉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

1903年是伴随着革命排满的呼声而来到江浙地区的。过去，我们往往过于强调“拒法”与“拒俄”运动的警醒作用，过于强调进步知识界从爱国到革命转变的急剧，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拒法”、“拒俄”诚然起了强烈的刺激作用，癸卯5月以前的运动诚然多半以爱国救亡的形式出现，然而江浙进步知识界的民主革命觉醒却早有积蓄，他们是比较自觉地跨越了“拒法”、“拒俄”运动而进入公然倡言革命排满新阶段的。

姑且不谈《新世界学报》和《大陆》在1902年的启蒙宣传，也姑且不谈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中革命思想的酝酿，就拿《苏报》来说，它的公开标榜革命排满，也在“拒法”、“拒俄”运动全面展开以前。1903年3月3日的《苏报》发表《军解》一文，已

① 蒋竹庄：《论南京陆师学堂退学事》，载《苏报》，1903年4月13日。

② 《童子世界》，载《江苏》，1903年4月，第1期。

③ 松岑：《今怀》，载《江苏》，1903年8月，第4期。

经提出“军国民教育”这个名词。并且强调：“凡陶铸一大民族，占世界优美特色之文明点者，未有其全国军人不流国民之血、堕国民之泪而能产出者。”3月12日，《苏报》发表《书近日新闻后》，以嬉笑怒骂的笔调宣传了东京留学生元旦团拜的革命排满演说。3月14日又发表《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一文，公开宣称：“迨戊戌政变，刚、荣之徒，窃握大枋，神皋旧壤，生机遏绝，于是汉族知身家性命终不足托顽固庸妄之手。仁人志士求其在我者，乃倡为自立革命排满之议。”并且勉励自命为中国主人翁的“汉学生”，不要以革命排满为口头禅，应该多务革命排满的实际。及至3月26日发表的《论东京留学满汉之冲突》一文，言论更为激烈，毫不掩饰自己的民主革命倾向。作者充满信心地说：“幸今者欧化东渐，民权自由之说，人群进化之理，日充积于青年之脑筋，有史（以）来遗传之性质为外界魔力所摄去者，一旦得复其本来，则其勃发不可复制，如火之燎原，水之溃堤，岂一手一足所能阻遏哉！浅识之士主调和之政策，而不知其无（可）调和也；顽固之徒谋压制之方法，而不知其无可压制也。孰优孰劣，孰胜孰败，一任天演之自然而已。”

（二）

1903年4月以后，“拒法”、“拒俄”运动紧相衔接，在全国范围出现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东北和南方边疆同时产生的严重危机，增添了进步知识界的紧迫感；而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又为民主革命思想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温床。爱国与革命，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新的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

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要在被侵略国家引起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运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这样一部民族运动史。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运动有其特定的主要承担者。在1900年以前，中国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广大农民以及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虽然有一些具有

资产阶级倾向的分子和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事，但他们都显然未能起支配作用。到 20 世纪初年，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极其活跃的姿态出现在民族运动的前列，并且逐步掌握了引导运动向前发展的主动权。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其中若干有识之士甚至相当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所从事的民族运动与往昔的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903 年，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中，对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显得空前活跃。但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把民族主义作为目的，而是把它当作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说：“欲达此莫大之目的（指‘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引者），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吾国人性性质之主义焉。无地（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① 当年的爱国志士，对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于严格意义的近代民族运动，确曾从理论上和历史上作过认真的研讨。譬如癸卯春在《浙江潮》上连续刊载的《民族主义论》，就是这样一篇代表作。作者说：“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维也纳会议成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大过渡，及法国第二革命起，而全欧之机大动，而澳意战，而德澳战，而澳匈战，而德法战，而东方问题，而爱尔兰自治。及其将终，而英阿之役，美西之役，日本之维新，义和团之扰乱。落落诸大事，无一非由是民族主义者磅礴冲击而成，故一部十九世纪史，即谓民族主义发达史可也。”

作者的论述显然不尽确切而且也很不全面（特别是对亚洲的论述比较疏略），但却表明作者对于自己正在从事严格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这一点，则是相当清醒和自觉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吾言民族主义，何以必推源于法国大革命？曰：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者也。民族主义之大目的，在统一全族以立国。然兹所谓统一云者，意志的统一，非腕力的统一也；共同的统一，非

^① 竞鑫：《政体进化论》，载《江苏》，1903 年 6 月，第 3 期。

服从的统一也。……若专制政体，则何有矣？”^① 他们是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来看待民族问题的，因而便把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君主专制政体联结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江浙地区的有识之士特地把义和团运动列为民族主义的“萌芽”或“胚胎时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义和团运动中蕴藏着强大的反帝斗争的力量，说是：“夫山东、直隶之民，虽文事不如吾乡，其程度或在中下之交，然打拳习棒，争欲灭洋，卒能创为义和团顽固之举，使各国不得不同心协力，劳民伤财，联兵以入此老大帝国之境。此其举动虽曰野蛮，然一时快心辣手，逞血气之勇，乃至使外人蹙额屏足，莫可谁何，此亦可以于困顿无聊之际，暂自慰矣。”^② 但是，他们对义和团落后的一面是有所批评的，并且特别憎恶清朝顽固派对义和团落后因素的利用与煽动。1903年5月8日的《苏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箴国民》的论文，就比较深刻地剖析了这种笼统的排外主义的认识低下和没有前途。作者说：“不观夫载漪、刚毅之徒乎，以忠义激励其士民，振臂一呼，扶清灭洋之裹红巾者连踵骈肩于都下。彼辈方掀髯色喜，以为尊君亲上之效果显而有征；即有识之士论东亚民族胚胎之迹者，亦且屈指及之。”但是，“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一点而起。故虽讲尊亲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事，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妬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二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楼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地主与农民本来是互相对抗的两种社会力量，“两盲同意，二聋联盟”的说法，自然是模糊了两者之间的阶级区别。但是处于低级认识阶段的笼统排外主义与尊君亲上之类封建伦理思想的麻醉，却有可能使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与一部分农民反帝斗争队伍结合起来，并且被清朝统治者诱引到错误的道路上，以致演成一出历史大悲剧。应该承认，

^① 《浙江潮》，1903年3月，第2期。

^② 《民族精神论》，载《江苏》，1904年1月，第8期。

20 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以往的反帝斗争是有所继承又有所扬弃的，他们把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文明排外”与“野蛮排外”两个名词，把自己的民族运动与旧式农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区别开来。过去在评说这段历史时，往往过分强调“文明排外”的对外怯弱和害怕工农群众斗争的弱点，而忽略了它还有比笼统排外主义进步的一面。其关键就是革命派的“文明排外”已经与封建顽固势力彻底决裂，并且具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所回顾的那样：“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删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之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当时，在江浙地区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字和言论中，都是把广西会党起义队伍称作“民党”甚至“革命军”的，而他们也就自诩为优胜于广西会党的“继此而起者”。即令是中国这样不成熟而又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当他们处于上升时期时也还是具有赢得未来的信心的。

(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不失为一面光辉的、战斗的旗帜，而且是一面更加具有广泛影响的旗帜。自然，民族主义也只有与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这面旗帜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才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在 20 世纪初年，不仅“扶清灭洋”的口号早已为人们所扬弃，而且古老的“反清复明”口号也日渐缩小其影响，只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散发出巨大的政治魅力。新的民族意识与固有的民族感情交织在一起，当人们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且自行抉择民族的前途的时候，他们的爱国精神便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翻阅癸卯这一年江浙地区的进步报刊，可以发现人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热爱自己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生存繁衍的地理环境。

新的民族觉醒首先表现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人们用尽各种各样美好的字眼来讴歌家乡的山山水水，因为家乡是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描述故土的山川形胜，不仅仅是为了唤起乡情，更是为了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之心，为了指明各省府州县以至乡镇对祖国应尽的责任。

浙江的爱国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

“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头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①

江苏的爱国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

“临长江，瞰天堑，流波汹涌，直趋东海，而环络江南十万迈当之面积者，此地势之足以称雄于大陆也。崇、淞天险，非江南之门户乎？狼、福横亘，非江南之咽喉乎？钟山龙踞帝阙凤翔，非江南文物之枢纽乎？震泽万顷，土地肥美；金阊十里，阡陌绵连，非江南财产之腹心乎？……而孰知欧美通商以来，沪滨京口，首辟商埠，而金陵，而苏州，凡江南有地理关系之区，无不为泰东西诸国强权所攫制。……举目河山，苍凉落日，对此粉碎寸裂之余，谁不起洛水伊戎之痛哉！”^②

小至绍兴一县，当年的爱国志士也是这样说的：

“诸君皆绍兴人也，试思绍兴者何人之绍兴乎？绍兴一切之事何人之责任乎？一家之中家用之备豫，子弟之良否，其为家人之责任无可疑也。即使家之人以事远游，其恐家用之不足而补助之，恐子弟之荒嬉而劝勉之，其责任终无可谢也。然则吾辈既为绍兴之人，则绍兴一切之事非即吾辈之责任乎？顾吾辈责任莫大于高绍兴人之人格，而使无为世界上之无关系之人。”^③

甚至连同里（属吴江县）那样的水乡小镇，人们也大声疾呼，

① 《浙江潮发刊词》，载《浙江潮》，1903年2月，第1期。

② 侯生：《哀江南》，载《江苏》，1903年4月，第1期。

③ 《蔡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载《苏报》，1903年3月12日。